



《国语》叙事研究

夏德靠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语》叙事研究

夏德靠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语》叙事研究 / 夏德靠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30 - 3268 - 1

I. ①国… II. ①夏… III. ①中国历史 - 春秋时代 - 史籍
②《国语》 - 研究 IV. ①K225.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2034 号

责任编辑: 罗 慧 徐 浩

文字编辑: 徐 浩

责任校对: 谷 洋

责任出版: 刘译文

《国语》叙事研究

《Guoyu》Xushi Yanjiu

夏德靠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责任编辑: 010 - 82000860 转 8345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一版

字 数: 270 千字

ISBN 978 - 7 - 5130 - 3268 - 1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8

责编邮箱: xuhao@cnipr.com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专业书店

印 张: 18.25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史官文化及其文献	(11)
一、史官源流	(13)
二、史之职责	(20)
三、史官文献	(25)
第二章 成书	(33)
一、作者问题	(35)
二、百国之“语”	(40)
三、《国语》的编纂	(47)
第三章 主题	(59)
一、战争与祭祀	(62)
二、聘问与宴飨	(72)
三、婚姻与家庭	(85)
四、天道与异记	(94)
五、崇礼与明德	(113)
第四章 人物	(135)
一、人物身份	(137)
二、肯定型人物	(144)
三、否定型人物	(153)
四、多面型人物	(162)

五、女性形象	(169)
第五章 文体	(183)
一、规谏与咨政话语	(185)
二、“三段式”与“事语”体	(196)
三、征引	(211)
第六章 影响	(233)
一、国别体	(235)
二、传记体	(244)
三、文学接受	(258)
主要参考文献	(271)
后记	(281)

绪 论

学界对于“语”这种文体或文类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可以这样认为，真正从文体的角度来审视、把握“语”的做法大概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恐怕与出土文献有关。李零先生就这样说过：“过去我们的印象，古代史书，‘春秋’最重要，但从出土发现看，‘语’的重要性更大。因为这种史书，它的‘故事性’胜于‘记录性’，是一种‘再回忆’和‘再创造’。它和它所记的‘事’和‘语’都已拉开一定距离，思想最活跃，内容最丰富，出土发现也非常多（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只是其中的两种，其他材料还未发表）。如《左传》一类古书恐怕就是用这类材料编成，现在的《国语》、《国策》也是此类古书的孑遗。早期史书，是以‘春秋’、‘世’为筋脉骨骼，‘语’、‘故志’、‘训典’为躯干血肉，这对后世有很大影响。”^①语类出土文献的大量面世不但改变了长期以来对“语”的认识，并进而引起了学人对其研究的兴趣。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语”最初的意旨应该是指人物有意义的言论。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②皇侃《论语义疏叙》说：“语者，论难答述之谓也。《毛诗传》云：‘直言曰言，论难曰语。’郑注《周礼》云：‘发端曰言，答述为语。’今案此书，既是论难答述之事，宜以论为其名，故名为‘论语’也。”^③邢昺《论语疏》亦云：“郑玄《周礼》注云‘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说：“此即毛郑说也。语者，御也。如毛说，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如郑说，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⑤董增龄在解释《国语》时说：

① 李零：《简帛古书和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2页。

②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7页。

③ 严可均：《全梁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4页。

④ 邢昺：《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⑤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言者直言，语者相应答。《国语》载列国君臣朋友论语，故谓之语。”^① 这些说法之间固然有差异，但均强调“语”指人物言论这一含义。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语”所呈现的特征较为复杂，不单纯为“记言体”，比如有言行并录的，如《论语》；^② 有言行相兼的，^③ 如《国语》《左传》中的“事语体”等。

在先秦的语类文献中，《国语》是一部较早而典型之“语”。这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理解：一是《国语》上承《尚书》而来，其中相当部分材料的来源较早；二是《国语》这部文献至少经历过三次编纂，也就是说，《国语》最终完成虽然在战国早期，但八国之“语”的文献形态在此之前已基本定型；三是《国语》所呈现的文体形式不但成熟，而且多元，在先秦语类文献中具有典型意义。正如“语”体长期以来不太受人注意一样，《国语》这部文献大抵有着类似的境遇。然而，随着人们对语类文献的逐渐注意与重视，有关《国语》的研究也渐次增多。

本书主要运用叙事学的相关知识、理论来考察《国语》。然而，无论是“叙事”还是“叙事学”都是不太好把握的概念。罗钢先生就说：“即使是在叙事学家们中间，也未能就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范围等这样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达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意见。”^④ 比如一种观点主张“叙事学研究的对象是叙事的本质、形式、功能，无论这种叙事采取的是什么媒介，无论它使用的是文字、图画、声音。它着重研究的是叙事的普遍特征。尤其是故事的说法，即故事的普遍结构”，还有的则认为“叙事学研究的范围只限于叙事文学，即以语言为媒介的叙事行为，它对故事不感兴趣，也不试图去概括故事的语法。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反映在故事与叙事文本关系上的叙事话语，包括时序、语式、语态等等”。不难看出，前者注重

① 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页。

② 参拙文：“《论语》文体的生成及结构模式”，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③ 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④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对故事的研究，后者侧重对叙事话语的研究。^① 罗钢先生主张“叙事就是对一个或一个以上真实或虚构事件的叙述”，也就是说，无论是故事还是叙事话语都应当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对象；这样，“叙事学是研究叙事的本质、形式、功能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包括故事、叙事话语、叙述行为等，它的基本范围是叙事文学作品”。^②

然而，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讨论的“叙事”或“叙事学”是西方叙事理论还是中国叙事学。杨义先生说：“300年前的评点家从史学文化的角度切入叙事研究，迥异于西方叙事从他们最敏感的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叙事研究。这种差异是否隐含着两种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呢？史学是中国传统的优势文体，语言学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中的优势领域，从优势文体向其余文体渗透，这是理所当然。”^③ 杨先生希望能够返回中国叙事本身。在他看来：“遵循‘对行原理’，我们在以‘行’去借鉴西方叙事学成果的时候，首先应考察清楚用以相对待的自己本身。”^④ 他首先从语源学和语义学的角度追踪传统“叙事”一词的意蕴：先秦文献中已经出现“叙事”这个词，不过“‘叙’是用顺序的‘序’，主要是讲奏乐或者丧葬仪式上的顺序，使乐器的摆放和仪式的进行，都整然有序。它和空间的左右、时间的前后都有关系，只不过它最早使用，不是在语言表述的领域，而是在中国非常看重的礼仪领域”，然而“真正名词化了的‘叙事’这个词的出现，是在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里面，《史通》是中国古代历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专门设了一章叫《叙事》，它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专门作为一种叙事法是在唐朝出现，而作为一种文类或文体，是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时期朱熹有个嫡传弟子叫真德秀，他编过一本书叫《文章正宗》。书中他把文章分成四类，一类叫辞命，也就是皇帝的诏令和大臣的奏章这类官方的文章；一类叫议论，也就是诸子这类说道理

①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③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④ 同上书，第10页。

的文章；第三种叫叙事，在这里叙事包括历史的叙事，也包括一些散文的叙事，比如说墓志铭里的叙事；第四种叫诗赋，抒情的文体。这种四分法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到了明清时代我们一些小说的评点家比如说李卓吾，金圣叹，尤其是毛宗岗，他们把叙事从历史叙事推广到了小说叙事和戏剧叙事，也就是说，到了公元17世纪的明清之际，中国的评点家就超越了史书、小说、历史等文体的具体界限，趋向于把叙事抽象为人类的一种重要智慧了”。最后，杨义先生总结说：“中国人是这样看待叙事：叙事学就是头绪学，就是顺序学。中国叙事学以史为源头，以史为重点，它是从史学里发展起来的，然后波及到小说、戏剧，它是把空间的分隔换成时间的分隔，然后按顺序重新排列这样一个过程。”^①整体上来说，杨义先生在建构中国叙事学的过程中，主要是利用东方思维的优势，紧紧围绕文史的角度来讨论叙事学，在这一视野下，“叙事学的要点就是把握三把尺子：一把尺子是结构，一把尺子是时间，一把尺子是视角”。^②

杨义先生的上述看法无疑为认识和把握中国叙事学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然而，就本书的研究来看，还有必要提及王靖宇先生的研究。王先生在《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这部论著中谈到自己阅读中国早期叙事文时比较关心的三个问题：“（一）如何从一般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和阅读早期叙事文；（二）中国早期叙事文多为历史散文，但其间显然杂有不少虚构成分，然则该如何看待历史叙述与虚构故事之间的关系；（三）如何从叙事文学角度来重新审视长期以来研究早期叙事文所遭遇到的一些考证上的难题。”^③来看看他是如何思考第一个问题的。他指出：“叙事文可说是具有连贯性和先后顺序的事件的记录。叙事文的结构中有两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被叙述的事件必须具有先后顺序，如果不这样，那就变成了单纯的描述而不是叙事。其次，仅仅是一系列事件本身，还不能保证必然构成叙事文。一系列事件之间，必须具有连贯性，才能构成叙事文。”因此，

① 杨义：“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② 同上。

③ 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叙事文的基本要素包括故事、人物、观点和意义。^① 故事是叙事文的构架，可以按照题材、形式或者作者意图来划分，比如，“按作者意图划分，又可分为讽刺的、寓意的、写实的等等”。^② 人物也可以依据不同的方法进行分类，例如从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质的角度来看，王先生“发现《左传》里有以下一些重要类型：善良而有为的君主，邪恶而愚蠢的君主，明智而又忠诚的卿士，有权势、有野心、有时还相当邪恶的卿士，为执着抽象理念的表面字义所害的可怜虫，无私而有远见的妇人，祸国殃民的妇人”，等等。^③ 故事必须有讲述人，王先生认为叙事者使用第三人称主宰了传统中国叙事文学，“在《左传》和先秦时期的类似作品中，叙事者常常作出无所不在的第三人称目击者的姿态”，他将这种方式称之为“史家”观点。^④ 至于意义，就是指“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总体涵义”，也就是主题。^⑤

讨论《国语》的叙事，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叙事”的要素，也就是从哪些方面或角度来具体细化、研究《国语》的叙事内涵。借助上面的分析，我们尝试以王靖宇先生的观点为主，再结合罗钢、杨义先生的看法，将“叙事”具体解构为结构、主题、人物、话语、接受这样几个层面。本书主要从这些方面讨论《国语》，并且也主要依此来安排章节。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补充一下，首先是结构问题。据杨义先生的考察：“结构一词，在叙事学体系中虽然已经是名词，但从它的中国词源上看，它是动词，或具有动词性。这一点非常关键，‘结构的动词性’，是中国人对结构进行认知的独特性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的叙事学贡献自己的智慧的一个重要命题。因此，我们在考察叙事作品的结构的时候，既要视之为已经完成

① 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8~9页。

③ 同上书，第11页。

④ 同上书，第16页。

⑤ 同上书，第18~19页。

的存在，又要视之为正在完成中的过程。”^① 杨先生高度重视结构的意义：“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的最大的隐义之所在”；因此，“要把握一部叙事作品有关宇宙、人生和审美方面的哲学，而不去解读他的结构，这就难免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之嫌了”。^② 其次，是话语问题。什么是话语呢？王一川先生认为：“‘话语’是语言在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形式，即人们的具体说话行为及所说的话。”^③ 他又在另一个地方说：“话语这个词是从法语里来的。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发明人是福柯。他认为话语大于语言结构和言语的总和。那么为什么是‘大于’呢？我觉得话语可能就是语言结构+言语+权力关系。……人们要利用特定的权力结构来表达自己的利害，说话不只是说话，而是表述人的生存方式、人所置身其中的权力关系。”^④ 高宣扬先生也指出：“论述尽管是由语句所构成，但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现象，也不是语言表达形式结构的问题。论述之所以重要，首先就在于它是一种‘事件’。作为一种事件，任何论述都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形成、发展、传播、演变和发生功效。论述的事件性，使它同整个社会和文化生活及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⑤ 这些论述归结起来，就是描述话语的权力性质，亦即话语权力的问题。最后，是接受问题。罗钢先生在《叙事学导论》一书中专门设置一章讨论“叙事作品的接受”，这是因为“随着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兴起，人们在叙事作品研究方面的兴趣和重点也在转移，逐渐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转向叙事文本的交流过程。人们不再依据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结构模式来确认文本的意义，而将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读者的阅读方式，他的期待视野和阅读成规，

①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39页。

③ 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

④ 王一川：《文学理论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⑤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以及他的阅读如何赋予文本意义等方面”。^①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接受可分为一般性接受和研究性接受，后者是以过渡到研究层次为目的的。研究中的作品阐释、批评以及作家论、鉴赏论、风格论等，都与接受关系密切。”^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讨论《国语》的叙事时也将接受这一环节纳入研究的视野；同时，本书所谓的接受，包括一般性接受和研究性接受，而且将文学史研究也纳入其中，尽管“文学接受史与文学史研究中关于作品影响的研究也有所不同”。^③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国语》时，既把这部文献视为一个封闭、自足的对象，同时也将其视为开放的体系，希望通过这种看似矛盾的取向多层次地展示这部文献的意义。

整体上来说，本书研究《国语》的叙事，主要思路是通过考察《国语》的编纂及成书过程来探究其文本结构的形成与特征，并在此过程中揭示《国语》的主题及人物类型；同时，从接受的角度分析《国语》这部文献在后世的流传过程。

①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② 尚学锋等：《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③ 尚学锋等：《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第2页。按：“人们谈论一部作品对后代的影响，是立足于作品本身所取得的成就，是把作品自身看成一个完满自足、固定不变的客观对象，探讨这个对象对后人文学创作发生的作用。在这种研究视野中，作品与后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单向的施受关系。而文学接受理论把本文看做一个生生不息的对象化产物，认为接受活动是读者对作品主动选择、具体再创造并重新发现其意义的过程。读者通过自己的接受活动，参与了作品意义的实现过程、作品的历史淘汰过程。”

第一章 史官文化及其文献

